

從文學年鑑到文學年鑑學

◎ 楊宗坤

在台灣，文學年鑑工作最初的開展與柏楊(郭衣洞)關係密切。早在一九五六年，他就曾實際進行過編寫年鑑的行動；可惜原先預定的出版商覺得這類書沒有什麼價值和市場，竟片面終止了出版計畫。一直要等到十年後，柏楊才在自己的平原出版社完成了這個夢想。也因為有他不懈地提倡和堅持，《中國文藝年鑑一九六六》、《中國文藝年鑑一九六七》、《中華民國文學年鑑一九八〇》三書方能順利面世。三書雖皆由柏楊所主編或主導，在相關設計上卻有相當大的差異。第一、二本同樣命名為《中國文藝年鑑》，處理的範疇卻大小有別：相較於第二本僅以一九六七年為採錄對象，第一本年鑑的「編例」則說明「本年鑑以記錄中國近十六年來文藝事業發展、文藝工作成果、文藝重大活動、文藝社團組織等為宗旨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書「總綱」收錄了彭品光〈新文學運動的回顧〉與呼嘯〈最近階段文藝發展概述〉兩文，其中彭文由一九七一年胡適〈文學改良芻議〉開始談起，一路延伸到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撤出大陸為止，全文瀰漫著「反共復國」的激切之情。今日重新省視此一安排，我們的重點不該停留在嘲諷彼時種種「神話論述」(discourse of myth 之自欺可笑(畢竟那是難以超脫的時代局限)，而應研究其挪用／佔據「中國文藝正統」的手段及策略。看似相當「中性」的一本文學年鑑，開卷卻只見聲稱握有「中國文藝正統」的作／編者利用再現歷史(the representation

of history)的機會，於行文間不斷複述、強化著自身的合法性與正當性。當然，它也同時確保了受眾(閱讀者)的合法性與正當性。我們可以說，所謂文學年鑑其實無異於人類其他的「文學產品」(小說、詩、評論……)，因為它們都是富含政治性的——雖然作／編者下筆前可能從未思及任何的政治意圖。把文學年鑑界定為「工具書」者，顯然太輕忽了它的教化功能。

極為有趣的是，國民黨政府似乎並不懂得利用這點。此本年鑑的編輯委員雖然多為立場親國民黨的右翼文人，全書倒未見政黨直接介入、干預的痕跡。或許執政當局認為這些編輯委員多年來已領受相當多「正統論」與「民族意識」教化，筆下所言不致背離「黨國之見」；或許因為缺乏實質的回饋與利益，當局也沒有提供什麼資金或出版上的支援。純就統治技術而論，當年沒有持續、大力地輔助「文藝年鑑」的出版，恐是政府蛛網般的文藝政策裡一個不小的「失誤」。

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七年的牢獄之災，使柏楊遲至一九八二年方編就《中華民國文學年鑑一九八〇》。在這期間，台灣損失了一本平原出版社已集稿過半的「一九六八年中國文藝年鑑」，最需要「累積」功夫的年鑑工作也陷入了長達十餘年的空白。應是那場牢獄之災使柏楊對國家權力有所反思吧？在這本文學年鑑裡已看不到六〇年代兩本年鑑那樣宣示意味十足的「總綱」與「附錄」，重點也改為由多位學

者專家各就其熟悉文類所撰寫的「文學概況」。除了從含括各門文化藝術的「文藝」範疇縮減為「文學」一門，本書也是台灣出版的所有文學年鑑中，唯一選刊作家之短篇作品者（不過這是當年去世作家的「專利」）。該是市場因素使然，《中華民國文學年鑑一九八〇》出版後竟無以為繼，這一中斷又是十餘年。在這期間雖有李瑞騰提出《中華文學年鑑》的計畫草案，卻一直得等到一九九五年十月張錦郎在一場座談會中發表〈台灣文學需要什麼樣的工具書〉論及了年鑑的重要性，這才引發與會者的注意與討論。雖然接棒者遲至一九九七年方現身，柏楊主編的這本《中華民國文學年鑑一九八〇》仍是文訊雜誌社編印的各本《台灣文學年鑑》極重要的參考——從後者的設計架構多為前者的延用與衍生即可得見。

前修未密，後出轉精，《台灣文學年鑑》就相當能代表學者與編印單位現階段對「文學年鑑」的認知高度。其中以《一九九七台灣文學年鑑》最為關鍵，特別是「綜述」部分擴充為十五篇，邀請的執筆者也更趨多元：除了台灣、日本及中國大陸的學者，連研究生也加入了筆陣。《一九九八台灣文學年鑑》更作了一個極有幫助的「索引」。發展至此，本地編纂文學年鑑的工程可說已頗上軌道。

當我讀著台灣的各本文學年鑑時，一些關於「年鑑學」的提問開始陸續浮現：

一、陳述與再現的問題：

此乃就文學年鑑的綜述(或概述)部分

而論。所謂陳述歷史(也就是一種「再現」歷史)，是指透過執筆者之目光去呈顯該年的文學流變。我們甚至可以說，每本文學年鑑的「綜述」就是一部小型的「年度文學史」。作為一名文學史讀者，我們會要求史家盡量清楚交代他的史觀；如果史家沒有另闢章節加以說明，至少要让讀者能在字裡行間清晰感知其史觀為何。我們是否該對綜述部分的作者們提出同樣要求呢？尤其部分文學年鑑一個文類還找了不只一名執筆者，恐怕更需要說明清楚吧？要知道，任何事件一旦經由執筆者陳述／再現，就會有不同程度的各式判準或意識形態穿梭其間，文學年鑑裡的這些「綜述」又哪裡能夠避免呢？另外，當執筆者要「再現」文學論爭或筆戰時請務必小心、時刻注意，並試著問問自己：我有沒有在評述語句中簡化、降低了對抗論述間的衝突程度？甚或在無意間作了不必要的「調解」？

二、分類與選擇的問題：

隨著文學年鑑越編越厚與各色「新興文學」不斷冒現，分門別類的複雜問題將更清楚地漸次浮出。既名之為《台灣文學年鑑》，自然就該對變化迅速的台灣文學現象有積極正向的回應；明乎此，何不勇敢擁抱這類向既有分類挑戰的「新興文學」文本？千萬不可將難以歸類者一律劃入「邊緣文類」或乾脆視而不見。至於「選擇」，我是針對「現代文學報刊發表作品選目」部分而論。對於哪篇作品該被選入，筆者並不特別關心。我在意的是：這

幾類選目由誰來選？其知識背景與判斷依據為何？每一類既然不只一人在作選擇，身為同一類編選者的「他們」究竟有何共同標準？這些問題看似吹毛求疵，但對一本嚴肅的文學年鑑而言，應該只能算是極基本的要求。自《一九九七台灣文學年鑑》起，每一類的編選者就都不只一人，而我們實在不知道這些「選擇者」是如何「被選擇的」？這其中有學生（分別來自大學部、碩士班、博士班）、有教授，也曾找過幾位作家來從事此一工作。筆者的意思不是在比學經歷高低（這與審美判斷力並無絕對關係），但這幾位「選擇者」不但從未說明自己的選擇標準，還各有其不同的知識背景與判斷能力，這讓我們如何期待同一比較基準的出現？如果只是為完成選目工作而選目，又何必那麼大費周章呢？這類問題值得編選態度嚴肅的文學年鑑工作者慎加思量。

三、性質與讀法的問題：

「文學年鑑的性質為何？」

面對這樣的問題，幾乎所有人都會以「工具書」作答。這個答案當然有其道理，但筆者前已論及：文學年鑑具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性，有時亦可視為一部小型的年度文學史。然後呢？還有其他可能嗎？我們若仔細觀察兩岸出版之文學年鑑的形式設計與章節規劃，數十年間的改變實在並不算大。今日文學創作的風潮更遞與前衛追求越來越明顯而快速，面對這個典範不斷變易的時代，文學年鑑是不是也有追求前衛性的可能？以上是對主編者說的，

那對於讀者呢？我們該「怎麼讀」文學年鑑？有沒有不同的讀法？又可以讀出多少罅隙來？再就研究者角度而論，是不是也該有人來研究：既出的幾本文學年鑑是如何被台灣讀者「接受」的？這些讀者是誰？他們為何要讀？讀後對他們又有何影響？

以上這些意見，部分是針對現今各本文學年鑑的明顯問題，部分則考慮到了未來這類年鑑可能遭遇的困難。李瑞騰於《一九九八台灣文學年鑑》中嘗謂：

編年鑑和研究年鑑是兩回事。沒有「年鑑學」作為理論基礎，也可以編出好的年鑑，縱使是土法煉鋼。我想這也對，編了再說，總得有些成品，否則研究什麼？

誠哉斯言。但如今鋼鐵已成，「年鑑學」的建構卻還在原地踏步。《二〇〇〇台灣文學年鑑》的出版及其問題，不正召喚著我們舉辦一場「文學年鑑學研討會」嗎？